

# 余祖胜烈士传略

刘 峰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这首题为《晒太阳》的诗，铿锵有力，锋芒毕露，是对黑暗旧世界的诅咒，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它的作者就是小说《红岩》中余新江形象的生活原型——余祖胜烈士。此诗写于1947年3月9日，当时他年仅19岁。

余祖胜，江西湖口县人，1927年12月19日（丁卯年冬月26日）生于湖北汉阳，他父亲余桂喜早年离家在汉阳兵工厂做工，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余祖胜出生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工人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长江中上游闹水灾，汉阳兵工厂停工，工人没有工资，余祖胜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父亲只好带着他回到湖口故乡。

余祖胜的家乡余古塘湾（现屏峰乡皂湖村）滨临鄱阳湖，

本当是山青水秀的地方，但因政治腐败兼以天灾，映入余祖胜眼里的是洪水汪洋，荒凉凄惨的景象。亲友们招待他的只有野菜，他所能玩耍的是与表哥一起放牛、学农活。在这里，他体验到农民和工人一样的艰辛生活，看到了地主恶霸与资本家工头一样凶狠。洪水退后，余祖胜又随父亲回到汉阳。9岁时，进入私立道生小学读书，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国民党军队作了伤兵医院，他只好进“贫民夜校”学习。这所夜校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周老师夫妇办的，每天晚上，作为课堂的酒曲作坊总是挤满了穷孩子。周老师教大家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大刀歌》，传授折纸工艺。余祖胜与周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因宣传抗日思想，周老师被警察抓走。余祖胜为周老师愤愤不平，十分痛恨警察，邀了几个工人子弟，每天晚上偷偷地用石头掷警察，并唱起了自己编的儿歌：“黑良心，真可恶，抓走先生，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下半年，战火烧到了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和一些重要工厂先后搬到重庆。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21兵工厂，余祖胜进了厂子弟学校读了三年级。一年后，余祖胜才12岁，他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仍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1940年日寇多次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余祖胜的七弟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双眼。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初含恨去世，才一岁的八弟被迫送给了别人。

童工的生活凄苦异常，每天做工12小时以上，还时常受打骂凌辱，许多童工死于肺病。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通过几年的夜校补习和自修，他不仅能看懂书报，还能看出他的真伪好歹来。他最爱看中共在

重庆的报纸《新华日报》，省下吃饭钱自己订上一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下，他的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言论，引起了厂方的注意，主管员借一次技术故障罚了余祖胜25个工，并指使工头故意刁难他。脾气倔强的余祖胜忍无可忍，挥起扳手同工头对打起来。不久，主管员就借故将他开除。这是1944年的事，余祖胜才17岁，已是有四年多工龄的老童工了。

同年秋，由一位姓沈的老师介绍，余祖胜考入21兵工厂附设的第11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师生，并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爱国民主人士，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为内战作准备，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和师生一道抵抗学校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反对体罚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第11技工学校是为国民党军事工业培养技工的学校，它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适应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的需要，校方严格控制学生流失。余祖胜的好友叶伟才同学有志于学医，想走“医学救民”的道路，偷偷报考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医科，而中途离校去西康就读。对此，教务主任说：“叶伟才是一个好青年，可惜误入歧途。”余祖胜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题为《好同学叶伟才》的文章。校方便以小叶离校时曾得到余祖胜的帮助，要余祖胜赔偿校服，后来则趁他患病住院，以“久旷潜逃”为名将他开除。听到消息，余祖胜气愤地赶到学校，大声疾呼：“我是生病，请了假的，不是久旷，更不是潜逃！”但他毫不留恋这种压迫学生的学校，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请师生题词留念。一位姓周的同学写道：“祝你离开这个樊笼，展翅高飞吧！”

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余祖胜失学失业呆在家里整整一年。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十分苦恼的。他

曾徬徨、忧郁、愤恨。在母亲和兄嫂的安慰和照料下，他坚强地生活着，更发愤地自学，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他结交了附近许多工人、船工和农民，并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下了大量的诗歌。

他与兄嫂一起，自己动手在住屋前搭了一间小棚屋，解决家里住房拥挤问题。对这个家他是这样描述的：“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我的家》，1947.2.2）他把这房比作“罗汉寺”：一家烧火十八家冒烟；他把自己比作“栏外人”：牛马是关在栏内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栏外的牛马而已！

他目睹和亲历了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辛酸生活：“主任的公子生日还得把‘份子’上，你若不然处处都遭殃，说不定两个山字一叠——请出厂，只得忍气把‘份子’上（《工人》，1946年.10.29）。他也了解到农民的痛苦：“么儿病得瘦，中药几十剂，吃下没效力；大娃虽没病，保长好狠心，拉儿去充兵，一去不回程，痛杀为娘心，六月借的钱，而今没有还，债主逼得急，原借只两万，要还四万几……”（《葫豆长花的时候》，1947.2.1）。眼见童年的伙伴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他悲愤地控诉：谁个夺了你的命，只恨那贪馋的地呀？不！是那些人面兽心的歹徒毁灭了你！……但是，而今啊！那些都在何处？我知道，他们又走近与你一样命运的女郎身边哪！（《忆凤》，1946年.10.25）。他同情那些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很想尽力帮助他们，可他自己也是个“栏外人”呀：“他抬起头默默的看了我一下，从胸前伸出一只手来，我知道他是一个乞丐……我停止了脚步，想给他一点钱，但衣袋里除了两张草纸外什么都没有，我惭愧地望着他滴着眼泪……”（《丐童》，1946.10.31写，载11.6《新华日报》）。

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把《丐童》一诗投给《新华日报》，

几天后居然以《陋巷》为题发表了。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迅跑！”他立志作个诗人，为人民呐喊，向反动势力抨击。他对心中的偶人说：“普希金啊！我愿帮你把没有喊醒的喊醒吧！这就是我的享受，我不需要银星的奖章，不贪恋那没有灵魂的黄金，只希望人类平等！”（《忆普希金》，1947.2）。

他再也不是一个“忧郁的孩子”了，他明白“暗淡是多么可怕啊！然而你愿意屈服，他的鞭子永远不会离开你。”（《忧郁的孩子》，1947.2）他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工人组成“读书会”，在工人村办起了《火焰》墙报。他在创刊词中慷慨高歌：“火焰、火焰！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你辉煌万丈的光芒，照遍了大地阴暗角落。你强烈火焰燃烧着魔鬼，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火焰献词》载4月1日《火焰》半月刊）。墙报还刊登了他《晒太阳》一诗。

墙报一贴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个重庆近郊宁静的地方突然沸腾了。当局立即进行阻止，墙报仅出一期便被迫停刊。这并没有使余祖胜气馁畏缩，更让他看到反动派的腐朽没落，感受到民众强烈的革命愿望，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斗志更坚定了，毅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经过一位女工的介绍，余祖胜认识了地下工作者任达哉，于1947年5月由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下党的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47年8月，党组织委派余祖胜再度入厂当工人，以利于工作的开展。经托人帮忙，他才在修枪所找到一个钳工的空缺，但要有几个月的试用期。他不计较临时工待遇低，看上去比以前卖劲得多。实际上他在努力与工人建立感情，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他和炮弹所工人高震明（地下党员）一道发起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经常带来

《挺进报》让大家传阅，激发工人的斗争积极性。正当他组织工人偷运武器支援解放战争时，却发生了《挺进报》事件：1948年4月1日，任达哉被捕，出卖了领导人许建业，于4月4日带领特务将老许逮捕，敌人在老许的宿舍里搜出一些同志的入党申请书，余祖胜因此于4月7日在修枪所被捕。在此头天，余祖胜已觉察情况危急，将党的“七大”文件和《工运史》等革命书籍进行转移，并通知一位姓谢的同志烧毁文件，注意安全。这一天，他吃过早饭仍照常上工，母亲怕他受寒，要他多穿些衣服，他搭了件毛背心离开家，就这样与母亲、兄弟永别了，余祖胜被捕后，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楼二室。

在狱中，余祖胜坚贞不屈，积极参加牢笼中的特殊战斗。他受过老虎凳、鸭子凫水等酷刑，但始终不吐一字，还乐观地安慰其他难友。他爱憎分明：特务放进奸细来作耳目，他便唱起顺口溜进行奚落；难友生病，受刑致伤，他则殷切照料。在恶劣的条件下，他还勤奋学习革命理论与外语，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

余祖胜有一双灵巧的手，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收集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迎接光明。当听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喜讯，他兴奋地在红心背面刻上“V”字，表达欢呼胜利之情。在他手中，就连小竹板也会变成精致的纪念品。他将一块竹板刻成心形，染上彤红的药水，由战友汪进仪用铁丝扭成的小链子连在小十字架上，伪装成宗教纪念品。小汪利用放风机会将这个工艺品赠给另一牢室的唐弘仁同志作为新年礼物，他说：“小余希望你自已刻上有意义的字。”唐弘仁便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刻上了“共产党万岁”、“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的英文字样，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带出了监狱。至今，这件蕴含着战友情谊和革命者必胜信念的历史文物仍陈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

战斗着便是欢乐，身居“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的牢室，也能“乐在其中”。1949年春节下午，大部分难友都在院坝里举行“联欢会”。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狱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则集中在楼一室举行诗会，正式成立“铁窗诗社”。余祖胜是诗友之一，他和另一难友轮流在牢门外放哨，保证诗会的顺利进行。望着载歌载舞的难友，他憧憬着到胜利的时候做一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震撼山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残无人道的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敌人在白公馆大屠杀之后，把渣滓洞的“囚犯”全部集中在楼下牢室，用机枪对着牢房扫射，然后又纵火焚烧……许多革命者在烈火中仍浴血奋战，以惊人的力量冲破牢门，穿过弹雨，推倒高墙，越过电网。结果，整个渣滓洞监狱仅15人脱险，余祖胜和200多难友一起壮烈牺牲。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会场陈列着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陈然、江竹筠、余祖胜等33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画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及各界代表先后沉痛地来到烈士灵前祭奠，余祖胜烈士的哥哥余祖德代表烈士家属向大会致词，表示要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投身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以后，《革命烈士诗抄》、《囚歌》等书籍相继选入了余祖胜的诗歌。1984年，重庆出版的叶挺等12位“红岩英烈”年画像中也描绘了余祖胜烈士的形象。

烈士的形象和精神永存！

（原载《江西英烈》第五辑，略有修改）

# 深切怀念余祖胜烈士

叶伟才

余祖胜烈士是江西省湖口县人，1927年农历11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兵工厂一个工人家庭里，当他刚满23岁生日的第二天——即1949年11月27日就英勇地牺牲于四川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中。他作为中国的一名年轻的党员的光辉形象，永生于渣滓洞的烈火中，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

我认识余祖胜烈士是在1944年7月里。他和我都是重庆江北21兵工厂附属的第11技工学校新入校的艺徒，入校后的第一个月是劳动，每天在大太阳下拔草，打扫环境。余祖胜和我是一个班，每天一块拔草劳动，又同住一间大寝室，他是上铺，我睡下铺。由于一同劳动，一同生活，性格又都比较内向，气质相投，我们俩便接近起来，逐渐获得了彼此的信任。在一年多的技校生活中，我俩成了莫逆之交，几乎形影不离，直到1945年10月我考上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医科离开重庆去西昌时，才不得不分离，岂知竟是永别。

我比余祖胜大两岁，是1938年随长沙儿童剧团离开家乡，在郭沫若先生领导的第三厅的支助下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38年年底在三厅的安排下并入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的儿童团体，剧团党组织当时是处于秘密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团员是不知道的。但是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又经常受到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的关怀和照顾，郭沫若先生直接的关注，团员们思想认识提高很快，觉悟也较高。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孩子剧团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支

特殊的战斗队，因而它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并于1942年下令改组孩子剧团。为了保护好孩子剧团这批革命的幼苗，在中共西南局的指示下，剧团党组织对全体团员进行了有组织的撤退，由于条件限制，只有极少数的人去了延安，多数则冒充流亡学生分别考入各类学校学习。我就是这样几经曲折来到十一技工学校，在技工学校，我只承认自己是流亡学生，从不提及在孩子剧团的情况，平时也不多话，不轻易交朋友，待人接物很谨慎，主要是避免国民党特务找麻烦，因此警惕性比较高，所以，有些同学误以为我很骄傲。我考入技工学校时的考分很高，榜上是第二名，同学们称我为技工学校的高材生，以为我文化程度高不理他们。而余祖胜对我却不同，他觉得我比别的同学更稳重一些，更老实更实在一些，和他一样也是个穷学生。和余祖胜接触中，我觉得他待人诚恳，爽直而不虚浮，他也有一股傲气，从不低三下四，性子很刚烈，他不轻易和别的同学搭话。由于他没有进过什么正规学校学习，文化程度比较低，考试成绩不好，多少有些自卑感，所以也不大和别的同学接近。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不大合群的青年便结成了好朋友，在以后的交往中，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家庭和他的过去。

余祖胜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不幸于1941年在重庆病逝。父亲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都压到他年仅十几岁的哥哥余祖德的肩上，家庭生活是相当困苦的。1944年我认识余祖胜时，他家里有母亲，哥哥、嫂子、侄儿、弟弟、妹妹，加上他共有七口人，虽然余祖胜到技工学校后，家里还有六口人，全靠他哥哥在厂设计室当工人的一点微薄工资和嫂子为人浆洗的一点零星收入维持生活，确实是很艰难的。他母亲——余妈妈很会持家，很能体谅儿女，虽然在简陋的工人宿舍中只有两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但屋里还是收拾

得很干净；穿着虽都是破衣粗服，但也是补缀得整齐清洁，是生活得持节自重的、很有志气的一家人。我和余祖胜成为好朋友以后，在休假日，我们常一块到他家里去。虽然他们生活很困难，但只要他们家逢上有点好吃的，他母亲总叫祖胜把我邀去，和他们一家人共享，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是一定要把我拉去一起吃团圆饭。余祖胜对他母亲是非常尊重与孝敬的，对他年轻的嫂嫂也很敬重，对他妹妹和双眼失明的弟弟是很亲爱的，就只与他哥哥祖德两兄弟间没有什么多的话说。当时余祖胜的哥哥祖德仅仅是个刚满20岁的青年，可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却紧紧地压在他肩上，母亲、弟妹、妻子和刚出世的女儿的活路全负载在年轻的祖德的单薄的身躯上，生活的艰巨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为了一家人生活，他不得不埋头在工作上，不得不忍辱负重，以维护自己在厂设计室里的一个小小的职位，艰难的生活把一位本来应当是生气蓬勃的青年锐气几乎剥落得干干净净。每当我在余祖胜家里看到刚下班归来的，拖着疲惫步子跨进家门的余祖德，默默无言地倒在床板上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感到无比的沉重和难受。而余祖胜却大不相同，他肩上还没有压上过多的重负，还象一只初生的牛犊一样，性子火爆爆的，什么也不怕，什么人也敢顶。他13岁到步枪厂去当学徒时，虽说年龄小，但性子挺硬，遇到不合理的事时，他就跟领班甚至主任干过仗，因之他吃了不少苦头，被领导开除过，可他从不后悔，从不示弱，他就是有一股要与恶势力拼斗到底的倔劲。所以，当年的余祖胜与他的哥哥余祖德两人年岁虽相差不多，在性格和气质上却有明显的差异，一个象刚上阵的小牛犊，一个却象已被打败了的羔羊，兄弟俩之间没有多少言语，弟弟祖胜还不能充分体谅到哥哥祖德的苦衷，哥哥祖德拿倔性子的弟弟也没办法，兄弟俩也就常常把各自的心思埋在自己的心底。我刚结识余祖胜时，他正处在有许多话无处说，心里有

许多疙瘩解不开，思想正十分苦闷的时候，他的眼光还只能看到自己，他的认识还只能局限在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短暂的十多年的生活历程的狭小天地里。他已开始尝到旧社会所加在穷苦工人身上的无穷苦难的滋味，开始感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兵工厂的代理人主管员、领班之类的所给予的迫害与欺凌，他要反抗，他要挣扎，他要出路，出路何在啊！？这正是余祖胜当时所要求所希望解答的。他是多么希望能向人诉说，多么希望有人能理解他，和他共诉衷肠，和他去探寻那划破黑夜的朝霞。

1944年7月1日，我和余祖胜一道跨入了这所兵工厂附设的技工学校，开始了新的艺徒生活（这所技校不称我们为学学生，而叫“艺徒”，似乎比普通的学徒又高一级）。当时我到技工学校学习，只不过是临时找个安身之处，既能有饭吃，又能有个学习的机会，一旦有可能就还要飞出去的，这也是那个时代国民党统治区许多暂时无处栖身的青年的共同处境。所以，我是在无处可去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考到技工学校来的。余祖胜原来就是21兵工厂步枪分厂的学徒，已有几年的工龄，有了一定的技术水平，本来应当是出师当师傅了的，只不过是因得罪了步枪厂的主管员和领班而被无理开除，不得不又重新考入技工学校再当次“艺徒”了。所以，余祖胜到技工学校学习，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生活所逼才进来的。在入学的动机上，我和余祖胜也有相似之处，都是被旧社会所迫，才到技工学校的。但是，余祖胜到技工学校来，不象我那样感到生疏，感到新鲜。对他来说，到技工学校就象他到步枪分厂一样，都是在21兵工厂范围之内，好似他在自己家里，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一样，家常便饭，没什么新鲜感。21兵工厂在重庆市区的北岸——江北，即嘉陵江的北坡上，是国民党在大后方最大一家兵工厂，它是由南京金陵兵工厂和武汉汉阳兵工厂迁来重庆后合并起来的，它有十多个分厂，规模宏大。余祖胜

的父亲是汉阳兵工厂的老工人，全家随厂迁到重庆后，就在21兵工厂定居下来了。余祖胜从21兵工厂建厂开始，就随一些家属小孩在厂内翻腾跳蹦，厂内没有那一处地方他不熟悉的，厂就是他家，他的家就在厂里。所以，余祖胜到技工学校后，也和其他一些考入技校的本厂工人子弟一样，象到了自己家里似的随便自在，对学校的主任、教官等，他们都见了不在乎，真是不卑不亢，那硬绷绷的味儿，那调皮的劲儿，叫人看了就象天生的一块块硬骨头。因为这是兵工部门的技工学校，对学生（艺徒）的管理是严格的，实行半军事化，艺徒进校后一律换上蓝布制服，打裹腿、戴布帽，胸前还要佩上符号。专门设有军训教官实施军训，早晚点名、一日三餐、上工上课都要集合排队，象半个军营。每周星期天是节假日，本地有家的星期六下午4时以后可以回家，星期天晚自习前必须回校；家不在本地的外地学生，星期六晚上若要外宿的，必须事先请假，平时一律不得擅自离校外出，艺徒们成天只能生活在三里多长的狭窄的小山沟中，附近的荒山荒坡都被竹篱隔住，学校就象半个牢笼。幸好21兵工厂的厂长是李承干老先生，这是个很厉害的老头，成天拄着手杖在厂区活动，是后方有名气的兵器制造专家，比较开明，他兼技工学校校长，但不直接过问学校事务。在他管辖的这么个大厂和学校里有个特点，就是不强迫工人或学生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很鲜见的。11技工学校里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而且还把牌子公开挂在学校图书室的门口，但我在技工学校的一年多的时间中，还没看到过三青团在我们学生中有过什么活动。当然学校里是谈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的，学校的训导处，军训教官就不是一般机构和一般人物，大多数是国民党特工组织和特工人员所把持的。学校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政治气味，它只抓学习，只要求学生把文化和技术同时按要求学好，在这方面学校主管人员确实下了一些功夫，文化课的教师有水平很高的好老

师，技术课的师傅是技术很过硬的老师傅。比如我后来是选学锻工的，我们的锻工房就有一位70多岁的老师傅，他是当劳工到过法国，在法国干了几十年后回国的，当金陵兵工厂从南京撤退时，他亲自把一座三层楼高的大汽锤从南京护送到重庆，不仅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厂工人的敬重，就他的技术在21兵工厂也是首屈一指的。由这样的老师傅来当我们的师傅，也可看到学校主管人员的一番苦心，当然这与厂长李承干老先生的关照是分不开的。我和余祖胜所在的学校就是这样一所比较特殊的技工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说，11技工学校在当时确实是一所办得比较好的技工学校，因为它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以后这批学生成长为21兵工厂（解放后改为长安机器厂）的重要的技术和管理的骨干力量。11技工学校实行的半工半读制，学生是一天到实习车间操作技术，一天到教室学文化上理论知识课，工学相长，同时并进。余祖胜原来在步枪分厂时，学的是车工，后来他选学的还是车工，由于他原来就是熟练的车床工人，实习车工房的老师傅也认识他，所以他一到实习车间就直接上车床做成品，当一名师傅用上了。在学习期间，余祖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文化课和技术理论课上，我和他虽不在一个学习班，但教室挨得很近。他学习很刻苦，很自觉，决心在文化上赶上来。他自知不足，经常找同学切磋，我们两人经常在一道学习研讨的时候就更多了，我也尽力给他一些帮助。这段时期的文化学习，对余祖胜确实有很大的促进，他进步很快，真象一节鼓足气的小火车头，迎面赶上来了。

余祖胜身材比我高，要高出我大半个头，大约在1.65米以上。平头，大眼，脸修长俊秀，下巴微微上翘，显出股倔犟劲。略带苍白的面色，明显的呈现出营养不良，体质也显得单薄。到技工学校后，生活虽然呆板，但比较有规律。技工学校自身办有养猪场，学生伙食办得还是比较好的，每日三餐，糙

米粗菜,还是可以管个饱,半个月还可以吃上一次猪肉。我过去在孩子剧团时过惯了集体生活,比较注意锻炼身体,到技工学校后,我们仍然注意锻炼。余祖胜也和我一道早晚坚持做操,玩单双杠。1944年的冬天,我和余祖胜还邀约了几位同学开始了冷水浴,我们每天清晨在起床号吹响以前就起床,穿上棉袄,几人端起盥洗用具跑到浴室,开始做几个动作,就把衣服脱光,先用冷水拍拍胸口,再用面盆从大浴池舀起满盆冰凉的冷水直往身上浇,每人浇两三盆冷水后,就赶紧用干毛巾擦身,这时只见每个人身上擦得绯红,热烘烘的,才赶紧穿上衣服和棉袄,这时每个人都感到身上无比的舒坦。当我们走出浴室时,迎来的好象不是冬天而是初春了。当我们再到盥洗室洗漱完毕,这时从浓浓的晨雾中才传来起床的号声。我们从容不迫返回寝室,整理内务,再准时地赶到操场集合,参加早点名和军训活动。经过这么几个月的生活和锻炼,余祖胜的身体也大变样了,脸色红润了,身体壮实了,精神抖擞,朝气蓬勃,你看他走起路来,昂着头,挺起胸,一直地向前走去。

余祖胜和我从1944年7月至1945年10月在11技工学校共同学习、劳动、生活中,我们之间更多地是在思想上交流,心灵上的沟通,精神上的互励。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假以后和每个星期天的白天,都是我和余祖胜单独活动的时间。只要天不下雨,我俩常坐在校外荒山坡上,面对多半山坡上大片的21兵工厂厂房,山脚底缓缓流淌着的嘉陵江,和江对岸的重庆市区,我们畅所欲言地漫谈,总有那么多的话谈,总有谈不完的话。有时我俩也去重庆市区转转,买点小物品,看看新闻图片和新华日报。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到达重庆时,重庆中苏友好协会办的图片栏,就有毛主席莅临重庆的照片,我和余祖胜就过江去看。那时在国府路国民政府对面的马路边就有一处《新华日报》的报栏,每次过江到重庆市区必须经过那

里，顺路我们站下看个十几分钟。有次我和余祖胜在那里看到《新华日报》上，登了一条关于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消息。《新华日报》发表了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径。我们看后也十分气愤，我回技工学校后就以“一个青年工人”的名义给郭沫若先生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上有这样的话：“国民党政府不需要你，但是我们青年需要你，广大民众需要你！”信写好后给余祖胜看了，就寄到重庆天官府一号郭沫若先生家里去了。后来据一位同志告诉我，我写的这封信很快在《新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可惜我和余祖胜都没机会看到。有时我还带他抄捷径从技工学校旁的乡间公路直插磐溪过江到沙坪坝，当时我有一些衣物、书籍及孩子剧团的一些资料寄存在沙坪坝，那是孩子剧团一位同志（尚嘉齐）的亲戚家里，我们叫她罗姑姑。罗姑姑（罗清馥）住在沙坪坝村一所小院里，她和曹靖华先生住在一个院内，没有闲杂人来往，地方偏僻。我有时去取些物品，都是祖胜和我一起去的，祖胜也认识罗姑姑。后来我把存放在罗姑姑家里的东西全部转移到余祖胜家里。我们每次去沙坪坝都是当天去当天赶回，来去好几十里路，在路上我们边走边谈，彼此总是有那么多的话。在交谈中，他谈了他的家庭身世，他在步枪分厂受主管员和领班的歧视和欺压，谈了童工的苦难遭遇，学徒的悲惨生活，谈了他怎样反抗主管员和领班的欺压，怎样被主管员和领班的无理开除。他每提到这些，两眼瞪得圆圆的，牙齿咬得紧紧的，气愤到了极点。虽然那时他才十多岁，但人间的酸甜苦辣，几乎都已品尝到了。比起祖胜来，我年龄比他大两岁，在某种程度上说阅历要比他丰富一些，但我由于在孩子剧团那几年中是直接在党组织关怀和卫护之下，还没有和旧社会的恶势力硬碰硬的抗争过，也就是说，我自己当时还没有经过生活和斗争的磨炼，还不是象祖胜那样真正经历过风雨、经过考验的具有钢一样的品格和意志，这是我远远不及他之处，也

是我永远也无法和他比拟的差距，但他的品格却永远是我所崇敬的，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第11技工学校，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一所办得有相当成效的学校，它的第一、二、三届毕业生，在离校后或未毕业以前就有不少人考取了高一级专科学校。学校当局为了防止技校学生的流动，从我和余祖胜这一届（第四期）起，降低了对学生的文化基础课程的要求，精简了教材内容，以图阻塞学生报考高一级工科学校的通路。为此，学校的这一措施就满足不了我这一类学生的要求，我就产生了提前报考高一级学校的想法。1945年秋季，我偷偷报考了重庆沙坪坝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化工系和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医科，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在两所学校中，我最后选上了西康技专医科，这所学校在当时的西康西昌（现在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西昌市），距离重庆有了千余里的路程，需要自费前往。我当时之所以弃近图远，一是想到我母亲和妹妹是帝国主义所办医院的医生害死的，我就想学医，将来当个好医生，为穷苦老百姓服务；二是想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也需要一批不畏艰难困苦的医务人员去解救他们的疾苦。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当时席卷大后方还乡东去的大浪潮中，我却决定去西南边陲地区，这确实要有一定的志气和胆量的。余祖胜对我的决定非常赞同与支持，他全家人也对我的西去给以关心和支持。他母亲余妈妈和大嫂千针万线纳了一双厚实的鞋底做了双青布鞋，并特地在鞋后跟上缝了两根青布带，以便走长路时更起脚一些。并给缝了一条伞套，把纸伞套在里面，便于背在肩上走路。这时我因没有正式的中学毕业证书，报考时借用别的同学证书考的，考后就还回去了。我就给郭沫若先生写了封信，请郭老师为我写份证明。很快郭老把证明寄来了，是用“军委会政治部”大信笺写的，这是郭老

对我的决心的支持与赞同，我更加下定了到西康去的决心。我卖去较好的衣服、被褥，勉强凑起了一些旅费，决定步行出发前往西昌。我是1945年10月15日清晨离开重庆江北的，那天我从祖胜家出发，背上一条军毯和换洗衣服打起的被包，穿上余妈妈和大嫂做的青布鞋，告别了亲爱的慈祥的余妈妈、大哥、大嫂和弟妹们，由祖胜陪送我到嘉陵江边。余祖胜想送我过江，要多送些路程，我把他劝阻下来，我一人在江北陈家馆码头上渡船。我和余祖胜两人的眼眶都红了，都忍着泪珠不让掉下来，待渡船离岸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掉过身去，赶紧抹去了离别的泪水。呵！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呢？船行到江中心，我遥望江岸，只见余祖胜仍站在江边巉岩上挥着手，他多么象只雄健的雏鹰挺立在岩端，骄傲地挺立着。那能知道我和余祖胜的这次分离，竟成了永别呢？

1949年11月底，重庆市解放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大哥余祖德，询问余祖胜的情况，希望祖胜能平安健在。岂知不久后，在祖德大哥的复信中夹带着寄来了21兵工厂召开追悼大会的会刊，祖德大哥的信上简单地介绍了余祖胜的英勇事迹，我这才知道祖胜是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渣滓洞中坚强不屈，还搜集了许多废牙刷柄，磨制成许多小五角星，赠送给狱中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祖德大哥在信中对我说：“据脱难的难友说，祖胜在渣滓洞监狱中还一直担心你的安全，还在惦念着你。”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亲爱的兄弟，敬爱的同志，新中国真正到来的时候，你却再也看不到了。我多么想再见到你，祖胜兄弟！但这是不可能了，我只能面对着追悼大会会刊上余祖胜烈士的遗容，寄以无穷的哀思，无尽地怀念，祖胜安息吧！你遗下的事业，我们，千百万中国人民将会把它继续下去，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和千千万万烈士们的遗愿的。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给祖德大哥和